

日共與蘇共當前新關係析評

侯家國

一 前言

日共與蘇共之間，雙方曾於今年四月十四日，各在其機關報上（日共「赤旗」；蘇共「真理報」）刊登「和解同意書」，結束十五年之久的中斷關係，重修舊好。

但這種和解，是否即能保證雙方關係的真正友好，殊令人感到懷疑。日共與蘇共間，正如歐共主義者與蘇共之間相似，有其不可調和的矛盾存在。此一矛盾，不管是真象蘊藏着假象，還是假象掩蓋了真象，至少在當前，這些已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黨，為與國內的其他政黨競爭，在面對生活與知識高度發展下的國民大眾，其發展的策略，不能不與莫斯科蘇共的發展方式有違。由於這是涉及自己的生存之道，標出與莫斯科不同的旗幟，實屬不得不然，不得不爾。

所以，即使蘇俄在國際間一連串不利於其自身的情況下，而主動採取與日共修好的作法，爭取日共，向日共低頭，日共為其本身的切身利益，自亦不敢遽作一百八十度的改弦更張向蘇共靠攏，至少還得故作些姿態。

七月十六日，由日共邀請主要資本主義十國的共黨組織在東京集會三天，表面上是為慶祝其建黨五十七週年的紀念活動，會議的名稱是「國際理論座談會」，似乎與蘇共並無若何關係，事實上這是日共在玩弄共產黨的鬭爭哲學——既聯合又鬭爭下的另一種形式的運用。

下面先談談，日蘇共之間的所謂關係的解凍。

二 日蘇共關係的解凍

日蘇共關係的齟齬，應追溯至一九五八年。當年日共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黨內開始分裂，革新派形成，十二月十日，黨幹部會發表支持蘇、中共的日本中立化聲明。一九六〇年，世界共黨會議在莫斯科舉行，確定「對他黨不干涉」的原則。一九六一年七月下旬的日共第八次全代會，宮本體制在黨內被強化。而六一到六三年，蘇共批判阿爾巴尼亞與中共時（所謂的中蘇共論爭開始），日共並未與蘇共採取同一步調。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宮本在日本NHK教育電視台初次發表「自主獨立的立場」聲明。日蘇共雙方對立的表面化，是在一九六四年，當日本國會對於批准「核子禁試條約」辯論終結，舉行投票之時^①，時為衆院議員的老日共黨員志賀義雄，不顧黨內的決議而投下贊成票，於是遭到日共之除名，但蘇共機關報「真理報」，却揭載論文支持志賀義雄之行動。於是，日蘇兩共黨公開論爭開始，關係因而正式破裂。六三—六五年，是日共中央的中共路線和蘇俄公開論爭的時期。

自一九六八至七七年的九年間，雙方關係本有多次癒合的機會，但日共都因涉及黨的自身利益而終至「同床異夢」。如一九六八年，雙方正常化正趨合意之時，因蘇俄的入侵捷克而成新的對立；一九七三、七四年，因越南問題，成爲新的論爭點；一九七五及七七年，雙方作過二次預備會談，但其後因日蘇漁業問題僵持不下，日本舉國反蘇，在民族大義之下，使得日共不能不生顧忌，改善兩黨關係之議，也就不得不暫爲冷卻。

日蘇共雙方關係的所謂解凍，是去年十月，日共委員長宮本顯治的「古稀之壽」（七十歲生日），蘇共中央忽然拍發友好的賀電而開其端。年末，「真理報」有二篇文章，評論日本共產黨的任務，其中說：「（日共）是日本社會中正在成長的有力勢力，本國勞動階級者爲其本身的利益及世界革命的發展，莫不寄予很大的希望」云云；而日共却以：「關係改善的第一個前提，是對極左過激分子以及各種反黨集團與反黨分子的鬭爭，絕不停止」，作爲同意改善關係的間接表現方式^②。

兩黨和解的基礎，是今年二月底在東京舉行的兩黨預備會議。此次會議的重點有三：（一）日共是代表日本共產主義唯一的黨的問題；（二）黨員曾以個人或集團藉共產主義之名而有策動反黨活動者的問題；（三）「真理報」曾以論文支持志賀之言論而妨礙正常化問題。此次預備會議即以這三點作爲討論的基礎，以求達成兩黨和解的目的^③。

這三點，稍加審視即可知，是日共要求蘇共，必須先謀求解決，才能繼續商談雙方關係之改善。完全是蘇共在牽就日共，使得會議進行方不致破裂。

兩黨關係正常化的正式商談，是四月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日共派出的代表是西澤富夫副委員長及立木洋國際部長，與蘇共的詹固拉基候補中央委員兼國際部第一副部長、烏里揚諾夫斯基國際部副部長及柯萬林柯國際部科長。會談至十三日達成協議，

註① 一九六三年七月，美、英、蘇「核子禁試條約」簽字，之後若干月，尋求世界各國政府也參加簽訂禁試條約。而日本國會討論，是一九六四年五月中旬。
註② 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九日第一頁。
註③ 朝日新聞，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第二頁。

隨即會見蘇共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蘇斯洛夫，而此次會談之結果，也爲日蘇雙方黨的中央所承認。

此次關於雙方正常化會談的公報內容，其要旨除強調會談期間雙方就若干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外，並就過去破壞兩黨正常關係的很多問題也作了深入的討論。蘇共表明了以下二點立場：(一)承認日共是日本的共產主義運動代表的唯一的黨；(二)公開聲明，蘇共與日共內部某些個人或團體，打着共產主義旗幟作反黨活動的行爲毫無關係（此即表明不再支持志賀的蘇俄派）。公報內容，重要的有以下各項原則性的確認：雙方強調，確立與各國共產黨間的相互關係是基於自主、獨立之尊重、同權、內部問題互不干涉以及國際連帶的公認的諸原則的嚴格遵守。不過，雙方也指出對若干問題的見解的不一致，如對帝國主義與反動派的反對問題，對和平、民主主義、社會進步爲目標的方向問題，基於一致的課題，表明可能的合作。最後並同意，兩黨以後要繼續此種正式性的會談，以尋求更進一步的了解④。

此種十五年斷絕狀態的化解，其背景是基於彼此有此需要。在日共而言：此種與蘇共的「關係正常化」被稱爲：「宮本路線的安打」⑤，當時在國內統一地方選舉中，雖在若干縣的縣議員選舉得到好的成績，但在全國選舉中，却連遭敗績。特別自去年袴田問題之後，日共地位一直不振，正可借此與蘇俄改善關係，突破困境；但在蘇俄而言：在長期的中蘇共對立的背景之下，中共正策動美、日展開對蘇包圍網。且在日本國內，北方領土、漁業問題等等正構成「反蘇親中共」的新的不利於蘇俄的輿論，而日共又打着「自主獨立」路線的招牌。所以，只有先與日共恢復過去既有的關係，以期關於兩國間的障礙問題，可先經由兩個黨的高層接觸取得諒解，並透過日共在日本國內造成輿論。當然，除此之外，蘇俄在國際關係甚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自去年來遭遇到的一連串的壓力，也迫使蘇共不得不先設法修復與日共的關係。

三 所謂的志賀事件與蘇共之讓步

志賀事件，是橫互在日蘇兩個共黨間影響雙方關係不睦十五年的一個問題。何謂志賀事件，不能不稍作說明，以探討當年分裂的背景。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日本衆院在會期中將部分「核禁試條約」列入議程，當時社會黨提出，投票批准條約時須採記名投票的強硬主張。社會黨此舉，爲的是對付黨內的結構改革派、反主流派，以及親中共派分子的混水摸魚。同時，因爲當時共產黨

註④ 朝日新聞，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五日第二頁。

註⑤ 指對黨的幹部而言，凡反宮本路線的，已無外力可資與援。而宮本顯治，藉此可肅清黨內的敵對派系，對宮本體制之權威的樹立，有相當助益。

反對簽訂條約，社會黨此舉亦係逼使日共在輿論中孤立，可謂一石二鳥之策^⑥。社會黨的這一倡議，對社會黨而言，固可渡過分裂的難關，但却對共產黨的分裂加上了催爆劑。

研究日共黨史頗負盛名的日本學人小山弘健，描述當時投票情況說：當日，剛好有蘇俄第一副總理米高揚率領的最高蘇維埃訪日代表團抵會場旁聽，亦正巧碰到衆院在外交委員長就「部分核禁試條約締結之承認案件」報告後進行投票之時。出席會議的共產黨中有四個議員反對，故取青色票投入投票櫃內；而日共另一議員志賀義雄，却獨執白色票，一邊大搖大擺向四週亮票，一邊登台投票。後計算票數，在總數三一九張票中，只有共產黨投四張反對票^⑦。

該次會議散會後，志賀即舉行記者招待會，將事先打字印好的「告諸位先生書」，散發給出席的記者。聲明中強調，禁試條約，雖然規定的尚不十分週全，如對放射能污染的阻止以及對核兵器發展競爭的抑制等等，但爲了日本與世界人民的利益，這一條約無異是向核試爆的全面禁止與全盤裁軍邁出極重要的一步。對這種條約的支持，不能只顧到黨的態度，而應兼顧多數人民的意願。就日共黨綱的精神而言，支持條約是兼顧了人民與黨的利益，是共產主義者的正確的態度。

對志賀的此種反日共中央的行動，十五日，蘇俄方面並無強烈支持的反應，只是莫斯科在其對外廣播中曾對投反對票的四名日共議員稍作非難；十六日，「真理報」則對志賀明白抗黨之舉表示重視，並掲載志賀的聲明全文；十七日，北平電台亦廣播志賀對幹部會的聲明全文。而正在中國大陸因病靜養的日共書記長宮本顯治，聞訊後則較預定時間提前歸國。五月二十日，日共舉行八中全會，議題主要是就志賀違背七中全會的決定而對禁核條約的批准採取贊成態度一事提出討論。最後議決，給予「蘇俄派」志賀義雄等開除黨籍的處分^⑧。

自此，日蘇共關係開始極度惡化，雙方斷絕關係達十五年之久。而志賀義雄等遭除名後即另組成以「日本之聲」爲名的政治團體，仍以日共中央之一支自居，並接受蘇共之後台支援（此一組織自前年起改稱爲「和平與社會主義」）。

日蘇共之分裂，其背景仍是中蘇共分裂之延長。日共中央的宮本路線，自與蘇共分裂後，與中共曾有一度蜜月，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與中共會談破裂止。故日共自一九六六年十月，第十次大會開除中共派西澤隆二的黨籍後，在外無大國奧援情況下，不得不正式的走所謂的「自主獨立路線」。

註⑥ 小山弘健，戰後日本共產黨史，三四二頁，芳賀書店，昭和四十一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註⑦ 同前，三四二、三四三頁。

註⑧ 當時出席的中央委員有五十七名，五十三名投票成票；投反對票的除志賀外，尚有鈴木市藏、中野重治計三人；持保留態度的是神山茂夫。候補中央委員三十四名，全部投票成除名之議。當時除志賀遭受除名處分外，尚有鈴木市藏等人。請參閱註⑥三四五頁，及朝日新聞社編，日本共產黨，三一七頁，昭和四十八年六月二十日第四版。

今天，蘇共基於其本身利益，一反過去的立場，對日共主流派的宮本顯治採取低姿態讓步後，自然是對志賀派的致命打擊。志賀對於自去年底開始的日蘇共進行關係正常化的商談，極為關切，對宮本在與蘇共商談過程中，指其為「反黨分子」的說法，提出答辯，認為：兩黨關係的改善，是黨內任何人都希望的。宮本所謂當年「黨內分裂是因為國外介入」的說法，則此次以「志賀事件」為前提的與蘇共謀求關係正常化，不也是對我黨自身的干預？此言顯得他本人的無聊而矛盾⑥。

志賀義雄這個日共中遭蘇俄出賣的元老，在日蘇共兩黨正式發表「和解書」後，表示他對這件事情看法的談話中，雖仍不忘情於蘇俄，但却也有不少憤懣之言。志賀說：「兩黨的改善關係，是蘇俄方面接受日方的要求採取積極努力的結果，希望因此能開啓一個新的時代。但是，對今後的事態，我仍感憂慮，我加入日共五十六年之間，對黨的重整、發展，都曾盡過力，即使後來遭到除名，但對共產黨的初衷仍保持不變。我們不能接受蘇共的企圖，對蘇共的政治、理論的功績，我們固應表示尊敬，但對蘇共對我們的人事與組織的干涉，則不應接受。今後作為日本共產主義者，希望不要挾外國的力量來解決國內的論爭問題⑦。」

志賀之言，誠有感而發；也因志賀之言，而了然於所謂日蘇共之間的和解，真是貌合神離，各懷異心。雖云和解，但仍是一種鬭爭、利用的形式表現！

四 主要資本主義十國的共黨東京會議

日共與蘇共之間雖云和解，但日共深知此舉作為其求生存之一種謀略運用則可，但蘇共絕不是其求生存的唯一支柱。日本是當今世界上主要的已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大國之一，在日本國內要想取得政權，只有藉選舉進入議會取得多數而採行和平過渡的手段，絕不能再強調蘇共的暴力路線。故在十三年前，日共即已謀略性的打出所謂「獨立自主」的路線，企求能予人以「與莫斯科無關」，甚至「與莫斯科相抗衡」之印象。

七月十六日，所謂已發達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法、英、義、西德、奧地利、西班牙、瑞典、墨西哥，連同日本十國共產黨的代表，在東京舉行以「國際理論座談會」為名的集會。表面上，會議討論的三個主題：「(一)已發達資本主義各國鬭爭的現狀與展望；(二)關於新國際經濟秩序；(三)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事業與和平」，與蘇俄並無若何關係。甚至，日共的書記局長不破哲三在開幕詞中指出：此次會議之所以在獨占資本主義東京七國高峯會議舉行後召開，其目的即在以「國際理論座談會」之成績與之作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同註⑤。

個對比，以顯示科學社會主義事業的優越性^⑩。日共幹部會副委員長上田耕一郎，在會議進行期間，所發表的「向新的成果邁進」的專題演講中，強調：三天座談會的最大主題，是與東京七國高峯會議討論的相同，如：能源危機及其影響、不景氣與失業、中南半島與中東危機等等的有關各獨立資本主義與世界資本主義面臨的深刻危機云云^⑪。

其實，這些談話，甚至專文，包括這次會議的主題，只是表面上的理由與障眼手法，其實質，乃是日共欲藉此次會議之召開，與主要資本主義十國的共黨結成統一戰線，在共黨世界中企求獨樹一格。如此則在國內足以表示日共國際地位之日高；在國際亦增加了與中共、特別是與蘇共相抗衡的資本。故三天的會議結束後，不破哲三在其閉式幕致詞中，即已隱約的揭出會議的目的與成就，他說在三天的會期中，十國的每個代表會就各國情勢與人民鬭爭、共黨方針以及內外諸問題，本着各自採取的立場，作了坦率的報告。不破並接着說明會議的特色，謂此次座談會，各自發表的文書是無拘無束的，對若干問題不作特別結論，此是在尊重各黨自主的立場的前提下，自由交換意見與經驗，此種意見自由交換的作法，對討論有益^⑫。不破哲三的閉幕詞，最後並預祝各國共產黨，追求危機的打開與本國進步及變革為目標的革命事業，獲得新的成功與前進。全文無一句提到與蘇共的新關係。從上述種種可以看出，在與蘇共和解三個月後的日共，亟思在資本主義國家共黨中，取得一領導的地位。在與蘇共分裂的五年間，經驗教育了日共，即使在國際主義兄弟黨的共產世界中，仍然是實力決定一切。十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黨東京會議，使得日共在共產世界中的砝碼，加重了不少，亦使日共在與蘇共的鬭爭中，又增多了不少蘇共必須與其聯合的理由。

五 兩個共黨關係的未來

日蘇兩個共黨關係之未來，不能單單從兩黨本身去探討，而應從有關的國際關係去尋求解答。此誠如日蘇兩共黨當年關係之破裂，也不能完全歸咎於「志賀事件」，實在亦有當時不可忽視的國際現勢為其背景。

志賀義雄與宮本顯治，在日共中本都屬國際派，只是志賀派傾向蘇俄；而宮本派，當時則走中共路線。在一九六一年秋左右，中蘇共論爭公開化，於是，志賀、神山等的親蘇派與西澤隆二、安齋庫治等的中共派，開始埋下新的鬭爭的火種。而宮本與

註⑩ 日共機關報：赤旗，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第一頁。

註⑪ 赤旗，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第四頁。

註⑫ 赤旗，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第二頁。

袴田等，則持「傾向中共的中立」^⑭姿態。只是，當時關於中蘇共的論爭，在日共內部禁止討論。後來，志賀事件發生後，傾向中共派份子，藉故對親蘇派開刀。

此一日共內鬨事件，發生在赫魯雪夫時代的末期（一九六四年）。日蘇共關係的斷絕，亦是因整個世局起了變化，而莫斯科內部各派之奪權亦轉趨激烈，使得蘇共之內外威信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對蘇俄的指名批判，才敢在這些過去的兒子黨中產生^⑮。

日蘇共關係的第一次癒合，是因日共與中共惡化斷絕關係後，一九六八年一、二月，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率一代表團抵東京舉行兩黨會談，表明與志賀派的所謂「日本之聲」俱樂部絕緣。如不因同年八月初蘇軍入侵「捷克事件」，則日蘇共關係的修復早在十一年前即可能已經來臨。

一般學者的看法，日共與中蘇共間的三角關係，是其對外態度變化的根源^⑯。今天，日共的機關雜誌「前衛」，在談到當年事件時，自稱「世界上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黨對我黨的干涉，我黨為國際反帝鬭爭與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堅持建設性的理性的態度，為世界共產主義的團結作出貢獻」^⑰云云，似是往自己臉上貼金了。因為直到現在，日共仍擺脫不掉（事實也無法擺脫）來自蘇共與中共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雙方今天所以能達成和解的主要國際背景，則是由於日本與中共間所謂和平友好條約之簽訂以及美國與中共之建交，所形成的美、日、中共三者對蘇俄包圍網的壓力。今後就蘇日兩國友好關係之維繫而言，蘇俄不能單單再依賴日本國內社會黨的部分人士的親蘇。而且，此時在日本國內，朝野各黨，有一般惡風，皆欲爭取與中共之友好關係，以謀求一點政治或經濟上的利益，作為內部派閥爭權之外援。京都產業大學教授民社黨的學者花井等，認為蘇俄的國家利益，一貫是對現狀的否定^⑱。否定之後，才能打破困境，尋出生路。日蘇共之間，此時再度發生關係，不也是蘇俄對現狀否定的一部份？因為只有爭取與日共的友好關係，才是符合蘇俄當前的國家利益與黨的利益。

所以，自今年六、七月以後，日蘇官方之接觸亦又見熱絡，即是蘇俄在改善日蘇共兩個黨的關係後，對執政的自民黨政府的親善表現，也是蘇俄企圖突破當前對日困境，以及國際圍堵的各種做法中的一種吧了。同時，日共在向自民黨政府提出之對外

註⑭ 高知聰，日本共產黨肅清史，第二七九—二八〇頁，株式月刊筆社，昭和四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二版發行。

註⑮ 小野田政，日本共產黨的全部，第二三五—二三七頁，產經新聞社出版局發行，昭和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註⑯ 榎孝太郎，赤裸的日本共產黨，第二一三—二一五頁，日新報道株式會社發行，昭和四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三版。

註⑰ 若林暹，日蘇兩黨關係與「志賀問題」，前衛，第四三九期，一九七九年七月號，第一一六—一二九頁。

註⑱ 花井等，美、蘇、中、日在東亞的國家利益，改革者月刊，第六十六—七十八頁，昭和五十四年五月號，民主社會主義會議發行。

政策中，若干方面亦已逐漸與蘇俄的外交利益趨於一致。如七月十六日，日共中央向太平正芳提備忘錄，要求日本在難民問題之藉口下，勿參與政治攻擊越南之行動。甚至要求日本政府應表明：中共攻擊越南，是與中越雙方簽署的雙邊條約相抵觸的^⑲。而七月二十日，蘇共的「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發表新聞，轉載此一消息，予以對外宣傳^⑳。日共此一主張，雖不敢說是蘇俄背後之預謀，不過，至少亦表示日蘇共在對越態度上，其外交利益相結合了。

日共雖已與蘇共修復雙方黨與黨的關係，但至今仍自認自己是屬於「歐共主義」的黨，與蘇共與中共是截然不同的！並認為蘇共與中共，都是「大國主義的霸權主義（Hegemonism）」^㉑。

在此情形下，預測日蘇共未來關係的發展，是頗不容易亦是頗不穩定的！不過，日共為在國內維護其生存的最大利益，必然仍將打出歐共主義的旗幟，以表示其自身與蘇共之間，並不完全一致，是可以斷言的。

註^⑲ 赤旗，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第一頁。

註^⑳ 莫斯科華語廣播，蘇俄「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播。

註^㉑ 朝日新聞於七月下旬東京主要資本主義十國共黨代表會議後，邀集日本、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四個有代表性的歐共主義的共黨代表舉行座談會。此處所引是在該次座談會上，日共上田一郎黨副委員長的發言中語。請參閱朝日新聞，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第四頁所刊載之座談會的全文發言記錄。